

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绝不仅仅适用于佛教，任何一种当代中国宗教只有本着“本义”和“我义”的基本原则，在保持各自理论特征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才能够得以更好的发展和传播。

（作者刘聪，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 道教文化所含蕴的地域特色

葛 壮

现在羁留于大洋彼岸的吴亚魁君的大作《江南全真道教》（中华书局，2006）揭示江南地区的全真道教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展现了其中所包纳的和北方全真道所迥别的地域特色。在笔者看来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颇有建树：

“江南”二字所涵盖的准确地域概念为何处，历来说法不一，它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在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春秋至秦汉，江南甚至包括了湖北境内长江以南部分和湘、赣一带，唐、宋时在江南道或江南路中还包括湖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区，清朝顺治年间专门设有江南省，康熙时才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习惯上仍合称为江南。除了朝廷的行政区划外，江南在民间的意识中多专指苏南和浙江一带，而在古代，这里其实又叫“江东”。为了对全真道教在江南的流布进行清晰地阐述，吴亚魁主要将此地域概念集中在所谓的“六府一州”之地，即：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这里其实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粮仓米窖，特别是唐代以降，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之后，“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表明了是地富庶和经济发达的状况，原本兴起于北中国的全真道教就在这样的地区流布开来，其文化上的意义体现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全真道教在丘处机（全真道教最大教派“龙门派”的创始者）掌教期间，曾应元太祖召请，在1219年带领18名弟子西行，于1222年在西域雪山昆都斯（今阿富汗境内）与成吉思汗会晤，对长生术极感兴趣的后者尊长春真人为“丘神仙”，政教关系一时非常密切，而挟此强大蒙元统治集团之嘉惠恩遇，全真道教趁机成为当时国内势力强大的宗教实体，而如亚魁在《江南全真道教》中所指出的，“全真道教的南传，大致与蒙元平定江南的铁蹄同一步调。”（第65页）1279年灭国的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城内先后出现的全真道教宫观，就有玉阳庵、重阳庵等。时人对南宋偏安朝廷那种不思进取和醉生梦死的颓废奢靡曾有过辛辣讽刺，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由于麋居着大量自北方南迁的人士，而在口音上都与毗邻的宁、绍平原的宁波话、绍兴话有着显著的差别，是故留下“杭州官话”之南地北音的语言现象。全真道教宫观在南宋政治中心即杭州地区的出现，是北方地区的宗教插在南方重地的文化标志，不啻为当时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又一生动例子。而书中引用清人所撰《长春道教源流》卷七，提到“宋平后，浙人多学全真者矣”，也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

二是强调江南道教原有格局对南传全真道教所产生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全真道教的南传，对其时江南原来道教的固有格局，固然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传统的道教分布状态必定遭逢这种文化生

态上的刷新而呈现不同于过去的面貌。江南六府一州原本是南方各符箓道派的洞天福地，该地区的西北背靠上清派的腹地江苏茅山；东南紧邻金丹派南宗的祖庭浙江天台山；西南稍远则是三山符箓、赣有其二的龙虎山、閤皂山；神霄派的源头为江西临川，以及净明道的发祥地江西南昌西山等。但正如亚魁在书中所称的那样：“江南六府一州的道教发展，不能不受到上述区域的道教文化形态的持续影响。”（第 52 页）及至全真道教南传并扎根下来后，“置身於符箓道教繁盛之地的江南腹地和三教融合、道派趋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势不能不与南方本位道教正一派互相影响，交参融合，乃至改换门庭，转皈正一，仍想独善其身、全其本真显然是不可能的。”（第 91 页）故此，在江南原有的传统格局中生存发展的全真道教，会有别于全真北宗，如明代的全真道士大都兼嗣正一之法，如倪玄素、彭素云、沈野云、刘渊然之徒郭宗衡等。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文化交汇过程中所出现的“橘逾淮而为枳”之效果。

**三是对江南全真道教在明代处于“沈寂”的定论提出挑战。**国内学界对道教在明代的状况，主流意见多认定明朝对道教而言是流年不利的朝代，道教日趋式微，呈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景象，在时间节点上则以明世宗嘉靖（1522-1566）期间为其盛衰的分水岭。而全真道教在明代的“沈寂”的定论，却在《江南全真道教》中受到质疑，作者轻车熟路地运用史籍与新发掘的材料，加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与元代全真道教之显盛和清代以王常月为代表的龙门派的兴盛相比较，明代的全真道教确实要逊色一些，但作者并不认为全真道教在有明一代全面沦落到“沈寂”的凄凉局面，特别是在江南一带，情况可能还有出入。该书引清人陈铭珪在其著《长春道教源流》中提出的“当明之世，全真之显著者，多出南方”之论，（第 185 页）并广引多种史料，介绍了彭素云、尹篷头等北方来的全真道士在南方活动的事迹，更让人感到，作者对学术界传统定论的并不全然苟同，吴亚魁认为江南全真道教在明代并非完全陷于“沈寂”，是有其学术依据的。事实上，江南全真道教在清代获得显著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作者所归纳的，有清以来 200 多年，至咸丰兵燹为止，江南六府一州境内的全真道教宫观，现已考明者有 31 座，在数量上几近於元明两代是地全真道观的总和。（第 249 页）而大多又出现在距离明朝不远的顺、康、雍、乾等清代前期诸帝时，这样的发展，正是凭依着全真道教在此前业已建立起来的人脉和信仰基础。只有到了咸丰初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所到之处，对佛、道教庙宇宫观进行无情地摧毁，才会真正从根子上打断道教等传统宗教的发展势头，令清朝前期王朝鼎盛时产生的全真尤其是龙门派“中兴”现象戛然而止。此后不绝如缕的江南全真道教一息尚存，只是在近代社会经济勃兴的湖州、松江（上海）等地，方又出现道教各派重振的景象。

《江南全真道教》作为一本介绍区域性文化发展历史全貌的学术专著，在所涉专题方面确实有很精到的论述，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笔者觉得作者若能在江南全真道教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意义上所作的阐述再完美一些，例如将其与北方旧地全真道教的同样特征作比较研究，或许会更加完整地凸显江南全真道教在地域经济发展形态和文化形态及人文心理因素等多重影响下所呈现的特征。笔者相信，把这种含蕴在全真道教文化中的江南地域特色展现得越是清晰，我们对江南全真道教的理解，即与历史真貌的距离也会愈加接近。

（作者葛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